

海上记忆

赵祖康在兴国路 324 号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1985年的一个夏日,刚入夜,兴国路324号花园别墅前的草坪热闹了起来。

周边的居民早早吃晚饭都过来了。新华街道泰安居委这晚在这里举办纳凉晚会。有人带来了孩子,有人带来了蒲扇和小板凳。小花园里也来了音乐家贺绿汀,他也是一放下碗筷就过来了。坐在居民里的,还有戏剧家黄佐临、画家申石伽。这一晚,他们的身份不是知名人士,而是住在这一社区的普通居民,他们来和大家一起乘凉。

灯光亮起来了,有人在花园里唱歌,画家当场题词助兴,就在纳凉的人群里,还有一位老人,也微笑着和大家一起纳凉。他就是兴国路324号花园别墅当时的住户,时年85岁的赵祖康。

从1958年入住,到1995年去世,赵祖康在这里度过了近40年光阴。他的孩子们也在这里结束了学生生涯,进入社会。两代人在此见证上海的沧桑变化,也在这里完成交接棒,各自出发,融入上海又一段精彩旅程。

五天四夜的代理市长

1945年,以抗战结束为契机,赵祖康一家从重庆回到上海。赵国通此时5岁,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乡。

出生于松江的赵祖康从小深受孙中山“工程救国”的熏陶,立志从事交通事业,报效国家。1922年,赵祖康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道路和市政工程,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道路会议,考察了美德等地的现代公路市政建设。1931年回国后,他一直在交通部门任职,领导修建了西线、西线、滇缅和乐西等抗战主干线。1943年起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战时运输局顾问。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带着家人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兼管全上海的道路。他们一家先被安排暂住在虹口公园靠马路的一处小别墅,后自己掏钱向一位多米尼加商人租下一处位于敦信路(今武夷路)的别墅居住。

1948年底,战事吃紧,赵祖康带着大女儿和二女儿留在上海,妻子带着赵祖康的母亲、幼女和两个儿子离开上海,避居福州。正是在此期间,赵祖康开始接触在沪地下党。1949年2月,他和世交好友的女儿钱抱珊夫妇吃饭,座中来了朴先生和一位李小姐(真名王月英),两人正是地下党员。1949年3月,赵祖康参加中国工程师协会代表团,与侯德榜、茅以升等专家联名上书,要求各项军事活动要保护厂矿、交通、学校等设施。

1949年5月初,解放军逼近市郊。出于安全考虑,赵祖康离开偏僻的武夷路住到留美时期的好友、交通大学冶金专家梁伯高教授位于长乐路的家中。就是在这儿,赵祖康度过了作为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的五天四夜。

5月23日,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上海解放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晚,才接替吴国桢做了23天市长的陈良正打行李准备“撤退”,匆忙之下决定让赵祖康担任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负责社会治安稳定并办理交接。

早已和地下党接触的赵祖康,将希望寄

从1958年入住,到1995年去世,赵祖康在兴国路324号度过了近40年光阴。他的孩子们也在这里结束了学生生涯,进入社会。两代人在此见证上海的沧桑变化,也在这里完成交接棒,各自出发,融入上海又一段精彩旅程。



赵祖康(1900年—1995年),松江人,道路工程及市政规划专家。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任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代理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工务局局长,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赵国通 1940年出生于重庆,赵祖康长子,上海市政府参事。



兴国路324号位置图



▲1982年1月,赵祖康(左)、王月英(中)、钱抱珊(右)在兴国路324号的花园合影
▲赵祖康和家人在兴国路寓所内
照片均由赵国通提供

托在新中国。5月24日夜至25日,解放军占领苏州河以南整个地区,赵祖康指示各警察局不要做任何抵抗,插白旗配合军队接管,同时要求各局主要负责人集中办公;25日,在民主人士颜惠庆等联系下会见中共军管会接收代表,商定照常上班、接管审核、恢复交通、保存档案等八项要求;26日上午,主持最后一次“市长办公会”传达布置各局落实;5月28日下午,向新上海的首任市长陈毅办理交接。解放上海期间,上海市区没有一天停水停电,市民生活不受干扰,平稳进入新时代。

作为编辑部的客厅

1920年前后,兴国路填筑北段,翌年筑南段,以法公董局秘书名命名雷达路(Route Legendre),1943年以江西兴国改名,沿路多为高级住宅。

赵国通记得,从福州返回上海后,全家一度租住在高安路16号5楼的公寓房内。1952年左右,赵祖康一家由机关事务局安排住到衡山公园北面的荣昌路(1980年改名为德昌路)36号内的干部公寓房。1955年,赵祖康担任上海市规划局局长,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翌年,全家被安排搬入兴国路324号花园别墅,此后直到赵老去逝。

在赵国通的印象里,父亲务实、低调。在赵祖康1949年的日记里,从年中到年底,记录的满满全是工作。他看得出,父亲是高兴的。

建国初期,赵祖康一直忙着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抢修上海的海塘、机场,实施肇嘉浜

户区的改建和工人新村的兴建,规划修建人民广场、西郊公园,修通诸多主干道。1958年入住兴国路后,担任副市长的赵祖康每天从这里出门上下班,每晚10点左右入睡。此时,几个孩子正是求学阶段,赵国通的三个姐姐分别考进北大、清华,赵国通考入同济大学。

他记得,父亲对子女的功课抓得很紧,回家第一句话就是问作业进展。但凡有利于求知的正当要求,赵祖康都会满足。看到赵国通喜欢动手,赵祖康就为这个儿子买了飞机模型制作材料,并对他的爱好多加鼓励。小儿子赵国屏住进兴国路时才10岁,他特别喜欢养小动物,赵祖康就允许孩子在花园里养鸡、鸭、羊,甚至允许他养了一整箱蜜蜂,让他进行动物养殖观察。

但在随后的“运动”中,赵祖康被迫停职。已过去六旬的他顶住压力,召集了当时靠边站的许多专家、教授、老工程师到家里,将兴国路住所一楼的客厅作为编辑会议室,组织了《英汉道路工程词汇》的修订增补工作。这本书后来于1978年重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专业参考工具书。

这里走出一个院士

1982年,兴国路324号,一位曾影响了赵祖康人生轨迹的“故人”出现了——1949年2月曾同桌吃饭的“李小姐”,即王月英,和赵祖康的朋友钱抱珊一起来看望赵祖康。他们在花园里留下了一张跨越33年岁月的合影。

也是在这幢花园别墅里,赵祖康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了子女们的人生轨迹。

二女儿赵国明从北大俄罗斯文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至今在当地工作。赵祖康1961年春节后出差广东时惦念爱女,填词“蝶恋花”一首(怀旧儿(国明小名)初赴内蒙工作):我向南方儿向北,南北迢迢,万里同春色。处处红旗情激越,临行“革命”叮咛说。

赵祖康还特地去书店买了一幅“昭君出塞”的仕女图,挂在床头墙上,每天起床看一眼。赵国通记得,1963年寒假,国明姐怀孕临产前回到兴国路家时,瘦得才七十来斤。

小儿子赵国屏没能像哥哥姐姐一样参加高考,而是于1969年赴安徽蒙城插队。他把对生物科学的爱好也带到了农村。在田头,他用粪做颗粒肥,进行过杂交玉米制种实验,还偷偷阅读《美国农业概况》,“文革”结束后,1978年,赵国屏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后又考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研究所,1983年被选拔赴美深造,1990年,赵国屏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但为了等待同去的妻子也读完博士课程。赵国屏希望在美国再待几年。

赵国通记得,那段时间,素来温和的父亲多次要求他代写家书,连番催促,要求通过博士答辩的赵国屏快些归国。他对赵国通说:“我已经90岁了,我要看到赵国屏回来,他是爹派的!”赵国通只得向赵国屏挑明:“他没有亲眼看到你回到他身边不放心!死不瞑目!”1992年,赵国屏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中科院,此后一直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工作,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也的确遵循父亲的志愿,将毕生所学用于报效祖国。由于领导团队在人类基因组“非典”演变基因方面做出的优秀成果,赵国屏于200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腌笃鲜

兴国路上的建筑群

兴国宾馆位于兴国路78号。宾馆大院占地面积13.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绿化面积8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90%。院内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200多株,其中一棵百岁以上大王松名闻江南,还有多棵百年老香樟。

这里在开发前为洛云浜西侧的农田,1932年租界当局修筑了雷达路(今兴国路)以后,外国洋行陆续在此建造别墅,供洋行大班居住。兴国宾馆大院内有13幢别墅,其中1-6号楼为太古洋行建造的专供洋行高级职员居住的花园别墅,分别取英国、德国、美国等建筑风格建造。

太古洋行于1867年1月在上海四川路14号查利洋行的旧址开张营业,为英国商人约翰·塞缪尔·斯怀尔和里查德·沙克尔顿·巴特菲尔德等合伙组建的从事商品贸易的代理商行。1872年1月1日,太古洋行筹资创办的大古轮船公司在伦敦注册,总公司设在上海,主要经营中国沿海、内河的航运,在上海、日本、中国香港间及中国香港、澳洲与菲律宾间均有定期航班。太古洋行还创办了一系列与航运相关的企业,如海洋保险公司、太古造船厂、永光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等。

兴国宾馆1号楼是1935年太古洋行大班约翰·塞缪尔·斯怀尔在此建造的花园式低层公寓,建筑面积1647平方米。这是一座二层混合结构的楼房,仿英国帕拉第奥式皇家古典官邸建筑,由苏格兰建筑师克拉夫·威廉姆斯·埃利斯在英国设计。他从未到上海现场指导过工程的施工,就是在建筑竣工以后,也未到上海亲眼看一看自己设计的这幢住宅。兴国宾馆1号楼前有开阔的草坪,院内古木葱茏,一棵百年香樟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景色宜人。

兴国宾馆2号楼系英国维多利亚滨海建筑风格,假三层砖木结构花园住宅,建筑面积800平方米,机制平瓦陡坡屋面多种组合,南立面由双坡屋面山墙和一座四坡屋面歇山顶组合而成,建筑体形丰富活泼。山墙及歇山部分用垂直直线条装饰,这是英国乡村建筑的特有符号。南立面,两层为两组三清水红砖弧形拱券的走廊廊,饰以清水红砖齿形纹饰。底层有9个开间的拱形柱廊,每间拱券均做券心石。底层立面整个以灰色为基调,以水下横线与建筑上部立面分开。建筑立面活泼、丰富、沉稳、新颖,加上屋面穿出的三座三孔和单孔烟窗以及北立面半圆形玻璃砖墙楼梯间,明亮通透,显得豪华生气。

兴国路72号大院内的各幢别墅在1941年前均为外国洋行大班居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国洋行大班纷纷回国,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陆续回沪。1949年,外国洋行大班们再度离沪,这里的建筑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别接管。(摘自《上海地方志资料》)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

遗失声明

东阳市富科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货柜提单壹份,船名航次:OOCL HAMBURG V.112W
提单号:SHCT013473
箱封号:APZU3782582-AN60368935
声明作废。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陈明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整理

留在了北京工作

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接待我们,招待得很好,后来他是黑龙江省的省委书记。在大连住了几天,去了沈阳。刚解放的沈阳,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感觉,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我们,大家的情绪很饱满。我们住着日本的榻榻米,吃的是棒子面、小米粥。接着我去了哈尔滨,我到哈尔滨时,丁玲她们代表团已经走了,坐火车去苏联了,她留下书和一些其他的东西给我,特别是留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精装本,扉页上写着:“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致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 一九四八,十月底去欧洲以前数日,于哈尔滨市。”这本书,至今我还完好地保留着。

哈尔滨有很多我的同学,上海时的,延安时的,其中有舒群、罗烽、草明、干学伟、陈锦清等等。他们先我到东北。听说我来了,他们请我去讲课,讲演戏,讲导演。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和干学伟、陈锦清三个人打麻将。上海时的一位同学,在沈阳苏家屯搞军工,研制坦克,我当时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平时就找他们玩。洛甫同志当时也在哈尔滨,他见到我,要我留在他那里做青年工作,我在延安搞过文化俱乐部,他很欣赏,所以要留我。我说等丁玲回来商量后再说。

我还保留着1948年12月的几则日记:

十二月七号,到了沈阳,没有看到小茵(即丁玲。编者注)留得有信,也没

有人能告诉我她此行的归期,倒有人告诉我,蒋祖林也到苏联留学去了。我为这事高兴,也为小茵高兴,祖林不愧为革命后代,不愧为丁玲之子!

十二月十四号,今天下午我带妹妹(即蒋祖慧)到了哈尔滨。从华北起身后,便和小茵不通信了。我拼命赶路,赶路,十一月三号到大连,到处打听,到底出国没有呢?打听的结果,总是失望,都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大概该走了吧,十二月初开会呢!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同时因为还有别的原因,决定在大连暂住,那种心情,正像一个猎人,追逐着什么东西,追着追着,那目标却如此可望而不可即,而且终于可望而不可即了。……住在文协,罗老太太(即罗烽的母亲)把小茵的信交给我。那熟悉而亲切的笔迹呀,当时便把信看了,讲些什么,也顾不了许多,只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慰。晚间去看朱丹,因为小茵有东西存他那里,在他那里拿出信,拆开了,但没马上看,周围人太多,那样会引人笑话了。

十二月十五号,把箱子拿回来,晚间看完戏回来,把留下的东西,检查了一下,对小茵在我们别后的生活,略多了解,放心许多。昨天祖林便来了,我们三人睡在

一个床上,祖林懂事了。我准备把自己的一双长靴送他,他适用些。

我在哈尔滨没有待很久,又回到沈阳。先到鲁艺,因为我的创作是以话剧为主,跟着一个文艺团体比较方便些。皇姑屯有个铁路机车厂,是制造火车头的,厂里的工人搞死车复活的生产活动,把在战争中报废的火车头修理好重新投入使用。我带了两个鲁艺戏剧系的学生去那里采访,体验生活,以此为素材写了一个三幕话剧《死车复活》。戏写完了,鲁艺文工团决定上演,由肖丁导演,带着演员到工厂去排练,我也跟随他们,就地修改剧本。夏天,这个戏在沈阳公演。但是这个戏里把大机器拿到舞台上电焊,又不注重写人,演了三场,效果不好。在这个戏之前,我还写了一个独幕两场话剧《老少心》,写我军暂时从城市撤退,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拥护八路军,向往解放区,投奔解放区的故事,在报纸上刊出了,写得比较快,从构思到写作只有三五天时间,因为写的是知识分子,我比较熟悉。有人对我说:《老少心》比《死车复活》写得好,我当时思想上并不以为然。

王玉清是丁玲在西战团时的秘书,后

来在延安做了陈云同志的秘书,陈云到东北,他也跟着陈云到了东北,在鞍钢当总经理。丁玲在国外回来,我们就约定,一起去鞍钢体验生活。

丁玲是1949年1月中旬从苏联回到哈尔滨的,2月就去了沈阳,3月全国文代会筹委会成立。4月,丁玲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5月从布拉格回到哈尔滨,后来到了沈阳,住在鲁艺,写访问苏联、东欧的文章。

1949年6月,丁玲应召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会议。去北京之前,我跟丁玲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商量好了,文代会结束后丁玲就回东北,我们一道下工厂去,体验生活搞创作。丁玲到了北京,文代会筹委会主任沙可夫同志提议,要我也作为代表参加文代会,6月下旬我随后也到了北京。

文代会期间,周扬提出,要丁玲会后留在北京主持文协的工作。本来,丁玲没打算留在北京工作,她到北京开会时连组织关系都没带。

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们有来自各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盖叫天等著名戏曲艺术家也出席了大会,并且为代表团演出。

丁玲和我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全国解放之初,郭老主持文联,茅盾、周扬主管文化部,丁玲在中国文协(即中国作协的前身)值常班。我则选择去了电影局。我们住在东单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里,这房子据说曾经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好几进院子,前面部分住着总务科的工作人员,第二进是各种刊物的编辑部,最里面的一进有一座楼房,楼上住着沙可夫、萧三两家,还空着两间,给了我们。

(二十七)

连载